加快发展文化领域新质生产力

文化与科技融合引领文化产业发展

□祁述裕 邓雨龙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探索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有效机制，加快发展新型文化业态。”文化与科技融合是培育文化产业领域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新型文化企业、文化业态、文化消费模式的重要抓手，是推动文化产业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文化与科技融合培育文化产业领域新质生产力

一部文化产业发展史就是一部文化与科技融合的历史。在当代社会，激光照排、智能校对等科技创新成果让出版产业告别铅与火、迈向光和电，以更高效率传播知识、传承文明；高清摄影、数字特效等新技术与影视工作者的创意相融合，使电影业不断推出风靡全球的新题材、新作品，使电影这个传统产业焕发出勃勃生机。文化与科技融合推动着文化产业各个细分行业实现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文化与科技堪称车之两轮、鸟之双翼，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不断创造文化领域新质生产力。

文化是科技创新的催化剂。文化通过价值观念、生活态度和偏好等决定人们的行为，为科技创新创造条件。深圳之所以能从小渔村发展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涌现出华为、腾讯、比亚迪、大疆等一大批代表科技前沿的企业，关键在于深圳确立了开拓、包容、敢为人先的城市精神。此外，随着当代物质生活的丰裕，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也为科技进步提供了新的应用场景。以网络游戏为例，因为有巨大的市场消费需求，网络游戏已经成为云计算、5G、AR/VR、边缘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当代数字前沿技术的试验场，成为推动前沿科技研发的重要驱动力。

科技进步则极大丰富了文化的呈现方式与体验模式，使文化生产、消费、传播等各个环节焕然一新，不断催生文化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新动能，网络视听、在线娱乐、自媒体平台、沉浸式文化场景等不断涌现，现代科技已经渗透进文化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科技的持续进步，为文化产业注入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动能，不断孕育文化领域新质生产力。

文化与科技融合推动文化产业转型升级

在文化与科技双轮驱动下，文化领域新质生产力集成多种前沿技术，成为兼具创新、创意的先进生产力，使当代文化产业成为科技应用最广泛、匹配度最好的产业之一。

文化与科技融合催生了数据、大模型等新型生产要素，推动文化产业增质提效。以数据为例，文化产业领域的数据从文化资源中采集而来，也在文化生产、消费中诞生，是实现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的关键要素。博物馆、图书馆等机构收藏的文化资源可以变成数据，舞台上演员的表演、网络平台中的视听内容可以变成数据，消费者的各种消费行为均可以变为数据。经过数据采集、标注等加工，能够实现要素报酬递增、低成本复用、催生新产业和新模式等重要功能。比如，敦煌研究院与腾讯公司联合推出的“数字藏经洞”超时空博物馆，就是在数据采集的基础上、开发利用数据而产生的创意成果。大模型则带来了人机共创的产业新生态，极大提高了文化生产效率。在第20届深圳文博会上，广东参展的8个代表性大模型让业界看到了文化生产变革的新图景。例如，有的大模型可以利用文生图、文生3D等功能帮助创作者快速生成创意素材，缩短视听内容制作周期；有的大模型可以帮助景区、博物馆等打造具有导航、翻译等交互功能的虚拟数字人，节约人力成本。

文化和科技融合带来了新材料、新工艺，丰富了文化生产方式，推动传统文化业态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文化产业通常被认为是低碳产业、绿色产业，实际上，一些传统文化产业业态也存在污染高、浪费高、碳排放高的特点，不符合新发展理念。例如，一些造纸业、烟花爆竹业等文化制造业的生产工艺较为粗放，对区域环境造成了一定影响；又如，一些大型晚会、实景演出、灯光秀等，片面追求宏大视角和奢华的感官刺激，对电力等能源消耗巨大。如果不朝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难免被时代淘汰。没有“夕阳”的产业，只有“夕阳”的工厂。通过深化文化与科技融合，能使传统文化产业业态焕发新生。以烟花爆竹业为例，广东是烟花爆竹规模化产业地区之一，也有举办烟花汇演的传统习俗。如能将新材料、新工艺运用到烟花爆竹的研发生产中，制造出具有低污染、低噪声、低能耗等特点的新型环保烟花或数字烟花，举办数实融合的烟花汇演，必能兼顾保护环境、传承民间习俗、丰富文娱活动的多重目标。

文化与科技融合重构生产与消费关系，实现价值共创。传统文化生产与消费的关系泾渭分明，消费者被视为被动的接受者。而在数字时代，生产与消费的关系呈现出动态性、模糊性等特点，在科技赋能下消费者以各种方式参与文化生产的过程。例如，近年来兴起的互动影游、互动阅读等，允许消费者自主决定情节走向。又如，通过众筹、定制、粉丝订阅等新消费模式，生产者可以源源不断地获取消费者的创意，满足其个性化、品质化、定制化的消费需求。随着文化与科技的深度融合，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可以利用开发商提供的AIGC、智能体中心等智能创作工具，将自己的想法创意落地，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提供更多可能性。

文化与科技融合推动了跨界融合。以科技作为媒介，文化产业正在与多种业态联动发展，在“破圈”中创造新质生产力。例如，广州市拿火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使用AirSonic声能纤维材料及一体成型技术生产出碳纤维系列吉他，该吉他搭载了SHARC音频芯片、HILAVA操作系统等智能模块，实现了多产业跨界融合，深受消费者喜爱，畅销国内外。此外，游戏引擎、虚拟现实、沉浸式体验等文化领域的前沿科技也可以赋能其他行业，催生出新的产业形式或服务模式。又如，美国通用游戏引擎Unity，除了服务于游戏领域的3D互动内容创作以外，也因其兼容度和易用性被适配到智慧城市建设、汽车智能座舱开发、超逼真虚拟手术培训等各行各业的应用场景中。

促进文化与科技融合需筑牢人才根基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快适应信息技术迅猛发展新形势，培育形成规模宏大的优秀文化人才队伍。”促进文化与科技融合，应积极适应科技进步带来的新变化，壮大优秀文化人才队伍，为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筑牢人才根基。

一是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带来的新机遇，培育一批具有人机共创能力的新型文化人才。科技进步，特别是大模型和生成式人工智能为文化生产带来革命性的变革。善用各种智能工具，实现人机共创，已经成为文化工作者的必备能力之一。未来的文化生产不再是人类自己孤军奋战，还需要和智能体、虚拟数字人等紧密合作。这就需要通过优化高校学科配置、开发产学研协作项目等方式，为文化工作者培养新的劳动技能，包括数据采集和开发的能力、智能工具使用能力、与数字人交互协作的能力等。也要看到，人工智能的大范围应用，将会对传统文化产业产生一定的冲击，一些职业和岗位将被AI取代。因此有必要适度超前引导这些濒临淘汰的职业向“提示词工程师”“人工智能训练师”等新职业转变，未雨绸缪，赢得发展的主动权。

二是打通生产与消费的边界、娱乐和工作的边界，提高价值共创能力。人民群众拥有无限的创造力，正在通过各种方式参与到文化生产过程中。比如，科普博主、非遗传承人、软件工程师等，各行各业的普通人，都能成为优秀文化人才队伍的一分子。应积极顺应价值共创的新趋势，因势利导，满足当代消费者自我呈现、自我表达的需求，将消费者的创造力转化为生产力。比如，开发智能创作工具、数字文化软件等工具，降低文化创作的门槛；开发通用游戏引擎平台、虚拟现实平台等平台，鼓励消费者创造和上传创意内容，为社会公众想象力自由驰骋、创造力充分发挥创造条件。又如，探索在影视、游戏、演出、综艺等文娱领域内，推出更多“AIGC+UGC”的新业态、新产品，根据消费者自主意愿生成个性化内容。赋予消费者更多选择权、参与权、创造权，催生出更多跨学科、复合型的文化科技融合内容。

三是积极拓宽国际视野，为汇集全球文化人才交流与协作搭建平台。互联网平台、元宇宙、第三代互联网等现代科技带来了全新的文化生产和传播方式，可以在更大程度上调动全球数据、资源和人才。应努力在网络视听、游戏社交、创意众筹、元宇宙等领域建设一批面向全球用户的内容平台和创意人才中介平台，为拥有不同背景的优秀文化人才交流和协作创造舞台。面对远程办公、数字劳务等新趋势，应建设一批数实融合的数字游民社区，满足其边旅行边工作、追求生活方式多样性、灵活安排时间、注重社交网络等需求。通过提供共享办公区域、开展远程协作、举办创意沙龙和文化体验项目等方式，吸引更多的国际文化人才，不断提升我国文化产业的创新能力。

作者简介：祁述裕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南方科技大学全球城市文明典范研究院访问教授；邓雨龙系中央戏剧学院数字戏剧系博士研究生

理响广东 ·岭南文论

坚持守正创新 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

□谭志敏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重大任务，明确改革路径和具体举措，为新时代新征程文化改革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指明了前进方向。文化体制机制改革作为文化领域一场广泛而深刻的变革，因文化兼具产业属性和意识形态属性，改革的过程更加复杂，更需要保持高度的战略定力，更需要讲究科学的方式方法。坚持守正创新，深刻体现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内在要求，《决定》更是将坚持守正创新作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原则，指导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改革发展。强化坚持守正创新的理论自觉和实践自觉，贯彻落实到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全过程各方面，既能确保改革的方向、道路、性质、立场正确，又能创造性地以新思路、新话语、新形式确保改革任务顺利落实。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中坚持守正创新，不是简单的守正加上创新，必须体现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要求，做到守正与创新相辅相成，做到变与不变、继承与发展、原则性与创造性的有机统一，应着重处理好三个方面辩证关系。

处理好社会文化发展一元领导与多元共生的辩证关系

新时代伟大实践证明，坚守马克思主义的“魂脉”，坚守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才能以“理论的彻底性”说服人，坚持守党的全面领导之正，坚持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正，坚持守人民立场之正，才能不迷失根本、不犯颠覆性错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文化建设和发展领域的一元领导。从内部环境来看，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观随着经济社会的深刻变革而呈现出多样性，部分人群的理想信念正面临严峻挑战。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并以理论创新引领文化体制机制改革。要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实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这是党中央立足新的文化使命和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律作出的重大部署。要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坚决反对一切削弱、歪曲、否定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行，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注意区分政治原则问题、思想认识差异问题和学术观点问题，共建一个风清气正、文化和谐的文化生态环境。从外部环境来看，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伴随着社会信息化和文化多样化的持续推进，既要看到各个文明间的交流互鉴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世界和平发展的动力作用，也要看到，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依然复杂，国家文化安全面临新情况。这就要求我们既要创造有利于全面、立体、多元的文化交流机制，又要时刻保持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的信念，正视冲突，和而不同，在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造就一个新的文化生命体，建设强大的文化软实力，增强国际文化影响力。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紧紧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才能更好地把握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价值和原则，在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中不乱方寸。

处理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性与发展性的辩证关系

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决定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中华5000多年文明宝库进行全面挖掘。要坚持“两个结合”，更加主动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以辩证且科学的态度去理解和把握中华民族的历史渊源，把握社会主义文化发展规律，提出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发展的正确思路。要围绕高质量发展这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在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之正的基础之上，以科技创新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如以5G、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文化领域的深度应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保护与创新发展，使优秀传统文化“活起来”，借力科技领域最新成果培育新型文化业态及发展新型文化产业，发展与传统文化相关的创意产业，重塑文化产业的生态。要依托科技创新构建全媒体传播格局，深入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在内容、渠道、平台、经营、管理等方面的深度融合，提升文化传播力、引导力，大力运用新技术、新机制、新模式，建立以内容建设为根本、先进技术为支撑、创新管理为保障的全媒体传播体系。要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之正，依托时代发展要求对传统文化作出内容上的新阐释，依托科技发展对传统文化作出形式上的新展示，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凸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恪守正道、革故鼎新、一脉相承的连续性，创“承百代之流，而会乎当今之变”之新，在改革机制、形式上“取乎法上”。要推动文化遗产的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要加强党对文化传承工作的领导，完善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相关协调机制，使文化器物、载体的保护和传承发展体现文化自信和注重导向性。

处理好文化产业发展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辩证关系

文化产业既有意识形态属性，又有市场属性。作为21世纪的黄金产业和绿色产业，文化产业不仅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点，也是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支撑点。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是涉及上层建筑领域诸多方面的系统工程，既与经济体制改革密切相关，又与政治体制改革紧密相连。宪法明确规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积极探索适应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要求的效率结构和功能结构，既要守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之正，更加注重社会效益，解决好文化产业发展成果能否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爱、公共文化事业能否为广大人民群众共享的问题，又要较好较快地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提升文艺创作生产能力，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数量，以满足人民群众对文化产品更关注其质量和创新性的需求。这就要求我们，加快建立有利于优质文化产品服务不断涌现的体制机制，优化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机制，建立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机制，深入完善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网络，推动城乡公共文化服务资源整合，推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均衡发展；建立群众文化需求征集和反馈机制，创新实施文化惠民工程，促进优质文化资源有效融入城乡公共文化空间和群众日常生活。要把握文化产业意识形态性的本质属性，以制度创新为内源力推动文化体制机制的全面深化改革，巩固改革成果。宏观方面要立足于顶层设计与系统规划，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以制度建设为主线，以新的制度朝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发力。中观层面要深化文化领域国资国企改革，出台政策推动国有企业在文化产业中的“领头雁”作用，打造国有文化产业的旗舰，引领文化产业发展。微观层面要推动文化事业和企业单位内部的组织与管理制度的创新，文化事业单位要创造敢于刀刃向内、勇于自我革命、锐意改革的政治文化，以文明互鉴的态度建章立制，客观理性对待外来文化。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我们必须更加注重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有机统一和共同增长。无论是具体作品的创作生产，还是单个企业的持续发展，乃至整个行业的蓬勃发展，都不能搞“唯经济效益”。

（作者系广州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建设老年教育体系 开发老龄人力资本

□杨芳 董晓晓

20世纪以来，全球多个国家步入老龄化时代，给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诸多影响。2021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中提出，要促进老年人社会参与，鼓励老年人继续发挥作用，把老有所为同老有所养结合起来，完善就业、志愿服务、社区治理等政策措施，充分发挥低龄老年人作用。学校、医院等单位和社区家政服务、公共场所服务管理等行业，探索适合老年人灵活就业的模式，鼓励各地建立老年人才信息库，为有劳动意愿的老年人提供职业介绍、职业技能培训和创新创业指导服务。老龄人口并不是一种负担，通过老年教育，挖掘老年人口生产力，可以促进社会经济发展。

老年教育是开发老年人力资本的基础

新时代的老年教育是人口老龄化工作的基础工程和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重要举措，是终身教育体系的重要环节和促进社会参与的重要保障，是开发老年人力资源的重要载体。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截至2023年末全国60岁以上的人口占全国人口的21.1%，迫切需要探索开发老年人力资源的路径。同时，大部分老年人有就业的愿望，招聘平台前程无忧发布的《2022老龄群体退休再就业调研报告》显示，68%的退休人员愿意再就业。因此，如何通过老年教育提高老年人就业的能力，对我国来说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议题。

新时代老年教育的定位也发生了相应的转变，不少老年人拥有丰富的社会知识和经验，可以很快地适应和吸收教育培训内容，迅速成长一名合格的生产者。通过了解老年求职者的现实需求，对其进行相应的职业培训，辅助其制定职业规划，提升老年人的就业能力，可增加老年人的经济收入。

老龄社会对老年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老年教育更具有针对性，瞄准市场需求进行专业培训，并保证经过职业技能培训后能够顺利入职就业。如有的老年群体需要进行隔代照料，为其提供育儿培训，帮助其考取育婴师资格证，成为专业的育儿师。生产性老龄化的需求能带动老龄教育的多元化发展，明确老年教育的未来发展目标。

老有所为是新时代的新趋势

当前，我国正处于人口老龄化的快速发展阶段，“银发人才”的开发将有助于补充劳动力市场的人才需求。同时，对于老年人来说，老有所为不仅可以避免与社会脱节，也可以提高其收入，增加自我价值感。

老有所为是应对新时代人口老龄化的需要。人口老龄化和预期寿命的延长是老有所为的客观基础。应对老龄社会，弥补劳动力的短缺，不仅要靠科技的发展，也需要开发“银发资源”，即挖掘退休后仍有继续工作意愿和能力的人。联合国第二届世界老龄问题大会，将承认老年人在社会、文化、经济和政治方面的贡献作为行动的首要目标，并指出：“当老龄被视为一种成就时，对高龄群体人力技能、经验和资源的依赖就自然会被公认为成熟、充分融合及富有人性的社会发展过程中一种资产。”老年人阅历及工作经验丰富，有较强的分析及判断能力，处事周密，专注投入，在言传身教、化解矛盾、传帮带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同时，我国人均寿命不断增加，2023年人均期望寿命达78.6岁。按目前退休年龄计算，大多数人仍有漫长的后工作时期，许多人在此期间仍在发挥余热。首届国医大师路志正102岁时，坚持每周出诊，带博士生和传承人。近90岁高龄的女画家耿玉琨每天通过社交平台讲述一幅幅丝路画背后的故事，宣传丝路文化。他们的经历告诉我们，老年人不仅过去是，现在仍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

老有所为是老年人幸福感的来源。“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老年是人生的重要阶段。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曾指出：工作之所以为人们所需，首先是作为解除烦闷的手段，其次是它给予人们获取成功和展露雄心的机会。他强调，工作是获得幸福的重要因素。泽林斯基在《40岁开始考虑退休》中写道：“如果你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睡大觉、悠然憩息、闲逛以及看电视上，以为如此一来就成了名副其实的闲人，那你就无法从中获得真正的快乐和满足。许多无所事事的退休者最终变得相当颓废并且对退休深恶痛绝。”据统计，1/4的退休人员会出现不同程度的退休综合征。所谓退休综合征是指老年人由于离退休后不能适应新的社会角色、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的变化而出现的焦虑、抑郁、悲哀、恐惧等消极情绪，或因此产生偏离常态行为的一种适应性的心理障碍，这种心理障碍往往还会引发其他生理疾病、影响身体健康。可见，老有所为是老年人实现个人自我价值、收获快乐和幸福的源泉。

重建老年教育体系 发挥老龄价值

近些年，各地整合政府、社会资源推动老年教育快速发展，但目前的教育主要满足老年人生活和娱乐的需求，而难以满足其自我实现的需求以及开发老龄的人力资源、提高其生产力的要求。随着我国人均寿命不断延长，通过老年教育，赋能老年人，挖掘老年人的潜力，让他们在不同岗位继续发光发热，既有利于促进社会活力，也有利于提升老年人的成就感。

首先，制定专门的老年教育政策体系。老年教育是我国终身教育体系的重要环节。老年教育政策的制订，既要关注老年人的晚年生活福祉，也要关注老年人的劳动价值。老年教育政策体系应当包括四方面的内容：一是设立统一的老年教育管理部门，可以由现有的老年大学进行牵头，并由地方政府提供财政和资金支撑，保障机构的顺利运行；二是选拔专业的教师团队，可以从专门的职业培训中心聘请专业老师，或者从当地的高等院校和职业院校聘请授课教师，组成授课队伍，为老年人提供专业的课程和相适应的教学内容；三是建设匹配的从招生、入学、考试、结业、就业一整套完整的政策管理体系，细化具体的管理措施，为老年人提供相应的教育管理服务；四是制定科学的教育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和监督考核机制，借助内部的政府部门监督和外部的社会大众对老年教育政策的执行进行监督。

其次，多主体发力促进老龄教育均等化。由于地域、人口、资源等方面的差异，在推进老年教育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公平正义不可或缺。政府作为公共教育的管理者，应发挥主导作用，主动将现有的老年大学、企业、专家团队、高等教育学校和研究所等各个方面的资源进行整合，设立专门的信息交流平台，联合多部门为老年群体提供多渠道多方式的教育选择，开放共享公共教育资源。同时，鼓励高等院校和职业学校定期为老年人开设不同类型的课程，满足老年人的教育需求。有条件的大学可以开办学历继续教育，满足老年人的学历提升需求。同时，对于人口数量达到一定规模的大型社区，要设置老年活动空间，开展老龄教育。现在很多老年人数字素养不断提高，且我国很多大学都有网络课程学习资源，如果能利用网络技术开展老年大学教育，不仅能提高长者数字素养，满足老年人远程受教育需求，还能打破时空限制，提升老年人力资源的素质。因此，多主体之间要形成一种联通关系，互联互通，以分工协作的方式共同促进资源融合，打通老年教育资源之间的壁垒，打破老龄教育的不平等，促进老年教育服务的均等化。

再次，供需结合提供老年专业课程。老年人一般具有三种学习需求：休闲娱乐类、职业培训类、自我养成类（兴趣）。当前，我国老年教育大多提供休闲类和兴趣类课程，缺乏职业性课程，为了更好地适应老年人力开发的需求，课程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优化：一方面，通过大范围抽样调查、实地走访，对老年人口的教育课程需求进行调查，对现有的课程进行完善，增强老年人的专业技能，拓宽老年人的就业范围。另一方面，可以根据老年群体不同的教育需求，组建专业的教学团队，选择那些具有长远发展的行业和丰富就业机会的社会领域，提供专业的职业技能知识培训课程，适应老年职业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同时，普通高校和开放大学可以探索老年学历教育，满足老年人学历提升的需求，推进老年人进行终身学习，不断提升自己的工作技能。

（作者杨芳系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董晓晓系佛山市民政局科员）